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1年)

目录

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 —— 兼论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	2
是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社会主义？ —— 评项观奇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	29
关于重庆模式要做好两手准备	35
什么是所谓的“宪政民主”？	38
列宁为什么要驱散立宪会议？ —— 就宪政问题答项观奇同志	43
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	47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 中国经济的三种前途	70

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兼论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

广胜（2011年10月26日）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思想界、舆论界的广义“左派”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在意识形态领域，左派不仅已经与所谓“自由派”或右派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而且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若干局部斗争中甚至能取得一些胜利。

客观上，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怀念社会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在遭遇了2009年大衰退的打击以后，正在酝酿新的更大的危机；美帝国主义的衰落趋势日益明显，世界各国的阶级斗争正在向革命形势发展。

在最近左派的争论中，出现了两种影响比较大，但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左派的发展方向是依靠“党内”的健康力量，逐步地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促成“左转”，以便集中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另一种相当有影响的观点认为，目前限制左派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党专制，左派的发展有阶段性，在目前阶段应以要求民主、反对专制为“最低纲领”，为将来在宪政民主条件下更好地斗争准备条件。个别同志、朋友甚至主张为了反对专制，左派可以与自由派联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左派内部发生分歧乃至出现激烈的争论，不仅不是有害的，而且是左派过去一个阶段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左派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本地、完全地错误的。在目前阶段，这种错误仍然属于革命阵营以及广义的进步阵营内部错误的性质。但是，如果不与其进行斗争，不保持警惕，不加以纠正，任其泛滥，那么它们的长远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乃至致命的。

从认识上来说，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是，极大地低估了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力量，而极大地高估了和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只看到资产阶级表面强大的现状，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危机乃至崩溃、无产阶级必然觉醒并团结起来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的前途。从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局限在目前左派运动中的反映。

通过分析和批判这两种错误观点，并澄清一些基本问题，将有助于左派在更巩固的基础上健康、有力地发展。中国左派的前途，在于逐步使自己锻炼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逐步地清除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确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既做无产阶级的学生，又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毛主席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毛主席首先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基本的阶级结构以及这种阶级结构下各阶级与革命的关系，以后又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也就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基本同盟军并在革命高潮来临时欢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革命策略。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人民重新站起来当家作主，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基本阶级关系，并据此提出未来革命的基本任务和策略。

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左派的任务在于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恢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关于这个基本主张，可以说在中国左派内部已经没有分歧了。正因为这样，今天中国的左派，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看来，还是在各种敌对政治派别看来，也就是毛泽东主义派，或简称“毛派”。

那么，左派内部在理论思想方面有哪些分歧呢？分歧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是部分完成、基本完成还是完全完成？分歧在于，中国未来的革命性质是什么，要不要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的过程和关系又是怎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可预见将来的历史任务？分歧又在于，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谁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是依靠所谓党内健康力量，还是靠其他的什么政治派别，比如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比如自由派，还是真正地、实实在在地依靠无产阶级？

在这些问题上，“左转”派认为，中国虽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这种复辟还不完全，还不彻底，红旗还没有完全倒掉。按照“左转”派的观点，目前左派的中心任务就是护党保旗，只要红旗不倒，就有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左派必须团结一致、全心全意、毫不保留地支持党内健康力量。如果左派不支持党内健康力量，或者“健康力量”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或者统治集团改旗易帜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也就没有了，左派也就没有前途了。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看，对于这些观点应当怎样认识呢？首先，必须尊重事实，而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中国现状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的暂时得逞，不仅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发展，才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同时在主观上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为在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加巩固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盛产假冒伪劣产品而著名于世的。作为消费者，要避免上当受骗，决不能只看招牌、只看商标，必须要仔细了解商品的实际内容，了解其真正的功能、质量、成分，才能做到不上当少上当，否则就会白花钱，甚至花钱买罪受，乃至危及自身的生命。

同样的道理，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时，我们也不能只看招牌，而必须看商品的实际内容，更不能明知自己买的是假货，却仅仅因为假货上贴了名牌商标而沾沾自喜，或者因为心理承受力低下而不允许别人指出自己实际上买了假货，爱护假货上的名牌商标甚至超过了爱护商品本身。

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性质呢？是资本主义，还是半资本主义，或者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或者是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要在各种纷乱的现象中理清头绪，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只要从马列的基本原理出发，尊重事实，不带偏见，不夹杂私心，那么，这个问题本来是不难回答的。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只能由中国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决定。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我们目前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人类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它既不同于封建主义或奴隶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它有哪些具体的特征呢？就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少数资本家私人所有，但是有时也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就各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来说，绝大多数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也就是雇佣劳动者或无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居于统治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地位。就社会劳动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统治地位，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既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也不是单纯地为了个人享受，而

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得劳动力价值。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通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外，往往还存在着其它的所有制形式，比如比较常见的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小商品生产所有制（例如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家庭农场以及工商业个体户），有时还有工人合作社。但是，这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大大加强了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一种形式，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建立了国有企业。在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值甚至占到整个国民经济产值的大部分。但是这些，并不改变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生产关系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呢？工业部门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工业的大多数部门，已经为跨国公司或与之相联系的外国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控制。在这些部门，国内私人资本也占重要地位。至于国有企业，在多数制造业行业已经濒于绝迹。工业中的国有企业目前仅限于能源、采矿、钢铁等少数行业，占工业部门产值的比重不超过 30%。

在服务业或所谓第三产业，除了银行、铁路等少数部门，也是中外私人资本占绝对优势。在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形式的农业企业增长十分迅速，但是尚不占农业产值的大多数。然而，农业的流通领域，包括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机械）的采购，已经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垄断。

综合看来，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估计不超过 20%。去掉小商品生产的产值（主要是农业产值），则明白无误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中外私人资本至少占有整个国民经济产值的 70%，这难道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绝对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了吗？

至于仍然存在的国有企业，在今天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而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看劳动关系以及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今天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早已经沦为完全的雇佣劳动者，不再受“铁饭碗”的保护，同时失去了养老、住房、公费医疗等社会主义权利，更没有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也名存实亡。虽然国有企业职工比私人企业职工在工资待遇方面稍好一些，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基本性质。

再看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众所周知，中国今天的国有企业，已经为大大小小的官僚资本家所控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各官僚资本家家族的私产。这些官僚资本家通过领取天文数字的巨额年薪，或收受贿赂、回扣，或公款消费，或其它手段，将国有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据为己有，实际上使国有企业成为自己发财致富的手段。至于国有企业利润用于再投资的部分，无非也是扩大资本积累，使官僚或私人资本家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发财致富罢了。

就整个社会的劳动者状况来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各类资本主义企业中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其余的劳动者则从事小商品生产，从属于资本主义在流通和其它领域的剥削。就发展趋势来说，雇佣劳动者即无产阶级将逐步成为中国劳动者的绝大多数。

至于分配领域，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在今日的中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广大劳动人民勉强维持生存，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不到人口 5%

的少数资产阶级手中。除了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对这样的事实还能做怎样的解释呢？还有怎样的解释是符合逻辑与事实的呢？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已经完全确立并占统治地位。现有的、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服务于少数官僚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目的。主要是在农业领域尚存的小商品生产关系从属于资本主义在流通和其它领域的剥削，不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已经完全、彻底地完成了，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只能是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而决不是别的什么阶级或阶层，更不可能是什么超越阶级利益之外的政治集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了，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接受失败并长久地、无限期地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对于左派来说，资本主义复辟了，是不是就等于世界末日来临了？红旗一旦倒掉，是不是就再也树不起来了？

事实恰恰相反。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悲观失望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方面与矛盾的次要的、占被统治地位的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今天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是过去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样的，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必将造成无产阶级胜利和资产阶级灭亡的条件。

关于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兼谈修正主义问题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并完全占统治地位，这是当下中国现状的基本事实。我们不能因为爱惜商品的商标，便对商品本身被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状况视而不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体谅一下“左转”派爱惜名牌商标的苦衷，进一步分析一下他们思想认识的来龙去脉。在“左转”派同志看来，虽然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左转”派同志也不否认的，只是认为这种复辟还不彻底、不完全），但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宪法（虽然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仍然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还有“健康力量”，仍然有通过党的自身的变化实现“左转”的可能性。

“左转”派的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个酷爱商标却无视自己买了假货的消费者，最终还是要吃假货的苦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是教条，而是真理。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法律以及上层建筑的其它组成部分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运行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律经常地、积极地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转，资产阶级才能比较放心地发财致富。

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发展了还是萎缩了呢？中国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是大大增长了还是大大缩水了呢？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地位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呢？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大发展了，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大大增长了，而劳动人民的地位大大下降了，那么，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一个实际上由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并积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现有的上层建筑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就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而一个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难道不就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吗？

凡是左派同志，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早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 1976 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华国锋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已经变质的“中共”就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不归路。随着“中共”确立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方针，就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总路线。而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形成，特别是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即党内走资派）逐步演变为官僚买办资本家，构成中国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势、也是拥有财富最多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也就在实际上演变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过程，至迟到 1992 年就完成了。正是在那一年，“中共”公开宣布要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决心对当时在工业部门仍然占优势的国营企业发动大规模私有化并迫使几千万工人阶级下岗。

如果对于这一点还有疑义，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中共”党员和干部的实际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首先，就基层党员来说，可以不夸张地说，99%的基层党员不信仰共产主义，完全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入党，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强烈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及其革命。不是这样吗？不妨设想一下，在国内的任何一个地区，任意找来 100 个名义上的共产党员，在其中发现至少 1 名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概率有多大？这个概率，恐怕还大大低于在普通群众中发现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概率吧？

当然，党的实权不掌握在基层党员手中，那么党的领导干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党政官员的腐败与“潜规则”的泛滥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物质生活方面，中央、省、市、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普遍过着资产阶级的或近似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最低限度，也是可以与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相匹配的生活。他们的家属普遍从事经商、金融和房地产投机等活动，直接充当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很多还充当跨国公司的买办。他们平常交往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同类就是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党，其领导干部，普遍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的家属往往不是资本家就是买办；他们在各种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所交往的都是资本

家，而从来不与工人阶级交往；那么，这个党，难道不是已经与它要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融为一体了吗，而这个阶级，难道不是已经在实质上占有了这个党吗？

我们不妨按照“左转”派同志的思路再进一步思考一下。如果党内确实存在着那么一股“健康力量”，这些健康力量并且确实想搞社会主义，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这些属于健康力量的党内同志，他们整天被腐败分子、买办和资本家包围着，难道就不会耳濡目染？就算他们想要做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稍微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官僚圈子里，别人都腐败，你不腐败，怎么能站住脚呢？最低限度，是失去升迁机会，往往还要被清理出“阶级队伍”。再设想一下，比如有那么少数一两个人，确实大智大勇，一直能做到身在邓（江、胡）营心在毛，终于有一天爬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那么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崇祯贵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想要挽救大明朝尚且挽救不了。一个已经变质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允许别人腐败，又不允许别人搞资本主义，中央能指挥得动哪一个部、哪一个省？即使是总书记，没有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支持，又能怎样？即便是他自己的秘书，都未必听从他的号令吧？

如果我们肯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就必须澄清另外一个与此相关联的错误。有些同志，沿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习惯，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称为修正主义集团，认为左派与他们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说法，虽然在左派中十分流行，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它严重混淆了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

无论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根据毛主席所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修正主义都有着严格与明确的定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映；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总的来讲，修正主义的一般特征，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推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主张工人运动的目的应当限于社会改良，主张阶级调和、阶级妥协。修正

主义在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它仍然属于工人运动内部的一种倾向和思潮。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仍然属于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采取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其目的是通过批判和说服教育，使广大工人群众摆脱修正主义的影响，接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展开的革命斗争是有原则区别的。

列宁在领导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始终是将其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斗争来对待的。毛主席所领导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采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的形式。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除了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以外，对于其他人，包括邓小平，毛主席仍然是按照党内矛盾来处理的。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不仅走资派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且在此之后，原来的走资派已经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并以这些官僚资本家为核心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也已经完成。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仍然称之为修正主义，就好比在说美国侵略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是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十分荒谬的。

如果我们观察邓小平上台以后官方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虽然官方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歪曲和篡改，但是可以说还算有一个官方的理论体系，官方理论家还试图在官方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某种形式上的理论联系。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做铺垫，也还算能自圆其说。这个时期的官方理论，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另一方面仍然提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仍然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比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对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主张限制；“共产党”仍然自称工人阶级政党，理论上还没有放弃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在生产关系方面，国营企业在工业部门仍然占优

势，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尚不算十分严重。那么，这个时期（1978-1992年），或许勉强可以算做“中共”的修正主义时期。

而到了1992年以后，更不必说1997年以后，在生产关系领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官方理论家已经放弃了一切在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联系的努力。所谓官方“理论”无非就是一堆随意拼凑起来的、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胡言乱语。所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除了更加拙劣以外，与一般资产阶级政客糊弄选民的花言巧语哪里有任何差别？除了理论白痴，谁会认为这些东西哪怕在名义上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关系？将“中共”现在的“理论”说成是修正主义实在是对伯恩斯坦、赫鲁晓夫等历史上的修正主义人士的侮辱。

有一家商店，本来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外挂了一块正宗纯金的金字招牌。后来到了儿子辈，实行“改革开放”，旧货清空了一半，另外进了一半西洋进口的新货，也有少量孔家店淘来的假古董，招牌也换了，还是金字，但是改成镀金，质地不祥，但估计好歹是铜、铁、锡一类金属。于是知情人都说这家店“修正”了。

再后来，到了孙子辈，实行“市场经济”，旧货全部清空，全部换成西洋新货和一些孔家店的假古董。因为是市场经济，要利润最大化，为了节约成本，招牌改为用朽木制作，招牌上的几个字撒点金粉了事，由于撒得不太均匀，若干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却仍有一些不明真相的顾客，因为对老店主有感情，认为这家店仍然挂着金字招牌，只是“修正”，尚未“变质”，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到这家店买货。其中有几个不知趣的，上去劝那孙子店主回心转意，回到老店主的办店方针，结果反被这孙子店主奚落，说他们妄想要“回到过去”，不能“与时俱进”，还威胁这些顾客说，如果他们再啰嗦，索性换招牌，金粉也不撒了。

远方，老店主的真正传人已经人丁兴旺，正在学习老店主的办店史以及儿孙店主的败家史，一旦学习完成，就会打出真正的金字招牌，到那个时候，撒金粉也好，不撒金粉也罢，不怕那个不孝子孙的假金字招牌店不垮。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兴旺发达的三十年。然而，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就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残酷剥削亿万雇佣劳动者的基础上，但是同时，也就造就了一个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造就了自己在未来的掘墓人。

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大约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 20%，现在，已经发展到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 50%左右，在未来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估计将发展到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占绝大多数。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壮大，而且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最近几年，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初步进行了大量有组织经济斗争。根据马克思主义所说明的无产阶级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其它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将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有能力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将面临一个国际工人运动的老问题 - 改良还是革命？

关于这个问题，左派中的一部分同志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弱小，社会主义暂时还摆不上历史日程；中国的现状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反对专制、要求民主，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能接受的普遍要求；左派目前应当力争“最低纲领”，首先争取实现宪政民主，在此基础上，为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赞同类似观点的有左派中的多种派别、倾向。有的照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认为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官僚资产阶级”，为此，左派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主张以“民族资产阶级”为核心），先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有的则从托派立场出发，认为现政权是“斯大林主义专制”的延续，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坏，应当先用不那么坏的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最坏的斯大林主义专制。有的，则又采用类似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孟什维克以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摆上日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加以深入评论，但他们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中国应该先搞“民主革命”，然后在一个不确定的、遥远的未来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放弃社会主义的要求，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满足于一般的“民主”的要求，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民主革命”派同志所期望达到的结果呢？殷鉴不远，仅仅二十多年前，国际工人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在这方面就曾经有过十分惨痛的、血的教训。

以波兰为例。团结工会本来是波兰工人阶级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但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团结工会逐步为帝国主义和新兴资产阶级所掌握，在“民主”的口号下，推翻了波兰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波兰社会主义，尽管已经变修，毕竟仍然保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保留了工人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权利。资产阶级上台后，马上大搞所谓“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工人阶级大批失业、绝对贫困化。很多国有资产被廉价卖给外资，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以及旧资产阶级的后代在私有化过程中一夜暴富。东欧其它国家和前苏联的情况大同小异。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曾经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方向。二十多年前，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曾经参加过由小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领导的所谓“民主运动”。那次运动的基本要求，正如现在左派中的“民主革命”

派所主张的，是抽象地、一般地要求“民主”和“自由”，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而是把运动领导权完全交给了小资产阶级右派。结果怎样呢？在运动的紧要关头，或者，必须充分发动广大城市工人阶级、争取真正的民主，而为此，就必须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或者，就只能投降逃跑。小资产阶级右派做出了历史的抉择：投降逃跑，而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右派宁可放弃民主，也决不愿意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右派，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样，就像魔鬼恐惧阳光一样，无限地恐惧任何可能的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任何与之类似的事物。

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独立地、大无畏地提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治要求，而是屈从于所谓社会各阶层普遍能接受的、而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所能接受的，抽象的、一般的、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不痛不痒的所谓“民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重蹈 1989 年的覆辙，严重推迟中国革命的进程。难道中国无产阶级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的当，上得还少吗？难道无产阶级的血是白流的吗？

列宁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所谓“民主”，无非是国家的一种形式，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些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在今天中国的左派中，“民主”也是一个经常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左派，就其社会阶级构成和来源来说，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是这样一些社会群体，他们在形式上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从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比较重要的各种工作（比如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育医疗、意识形态等），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比较高，因而通常其生活水平显著高于一般的无产阶级；运气好的时候，有的小资产阶级成员还可以上升为资产阶级。

中国的左派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组成，这在目前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会尝试走向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加入到左派的队伍中来，但是因此也就给左派队伍带来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

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在思考一般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时候，容易从书本出发，从想象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实际出发，从而经常在思想方法上犯有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在民主问题上，“民主革命”派所设想的实现途径大约是这样的。在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一起提出要求，比如通过上街游行的形式，要求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民主；而资产阶级中的某一派（比如“普世价值”派）或许也会赞成。于是，各方社会贤达一起在北京开一个会，比如制宪会议，颁布一部新宪法；各个地方遵照执行；然后就是大选，开议会，产生新政府。从此以后，中国政治就算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了。这样，无产阶级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特别是不需要流血牺牲），就可以获得各种政治自由，无产阶级可以自由地组成自己的政党，从此以后就可以在宪法保护下太平平地、自由自在地开展议会斗争了。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美好。但是，这个美好的如意算盘符合中国与世界的实际状况吗？

首先，查遍世界现代史，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方式真正夺取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还没有先例。最接近的一次，智利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政府所做的尝试，最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动的法西斯政变残酷镇压了。目前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所进行的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对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触动，查韦斯政权到目前为止还只能算做一个一般的进步政权。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资产阶级民主（由于篇幅所限以及出于讨论的需要，本文所谈的“民主”仅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确如“民主革命”派所认为的，对于无产阶级是一件大好事，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赞成它呢？为什么不坚决反对，甚至像在 1989 年一样让无产阶级付出血的代价呢？难道中国的资产阶级突然都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慈善家，真的会相信“公平和正义比太阳更加光辉”？如果不是这样，而实际情况是，凡是无产阶级赞成的，资产阶级就一定要反对，那么“民主革命”派所主张的“最低纲领”又低在哪里呢，这个最低纲领是真的比较容易实现吗，真的可以让无产阶级少付代价吗？

反之，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属于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那么一方面，既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资产阶级自己自然会去做，何须无产阶级争取？另一方面，既然是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去做一件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呢？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民主既对无产阶级有利，也对资产阶级有利，因此在现阶段，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资产阶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经有一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推翻封建贵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在 1848 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明确地认为，整个社会已经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 -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那以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2011 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难道还不如 1848 年的法国，或者还不如 1917 年的俄国？在已经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难道还需要退回去搞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其它阶级（如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都处于从属地位。那么无产阶级去与资产阶级联合，是要反对谁呢？是反对所谓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吗？姑且不论中国资产阶级的其它部分是否有任何兴趣与

无产阶级一起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如果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真的被反掉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剩下什么呢？另一方面，中国的无产阶级又能为资产阶级的其余部分，也就是私人工商业资本（有些左派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做哪些有利可图的事呢（如果无利可图，难道私人资本会对民主有任何兴趣）？是允许他们继续大搞血汗工厂、黑砖窑，还是允许他们对剩余的国有企业大搞私有化并且由他们（而不是外国资本）侵吞剩余国有资产的大部分？除了这些，无产阶级还有哪些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本钱呢？

咱们来谈一点实际问题吧，谈一些书斋以外的问题。在今天中国具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搞那种“费厄泼赖”（英文“公平游戏”的汉语音译）的资产阶级民主，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撇开各种广泛的社会历史条件不说，单就具体条件而言，要搞像模像样的资产阶级民主，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公民有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并且无人身安全之虞；二，选举的过程必须保证基本的公正，选票计算至少要基本准确，没有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行为；三，经过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其权威得到尊重，可以号令全国。

那么，今天中国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已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而在基层，很多地方的政权已经黑社会化，离开了地方的黑社会、土豪劣绅和宗族势力，很多地方的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就可以自由地大选了？

“民主革命”派的女士们、先生们（附带地也告诫一下自由派中有“良心”的朋友），请注意一个常识，选举是要由人来搞、由人来组织进行的。面对贪官、黑社会遍地的局面，这个“费厄泼赖”的选举怎么搞呢？首先，在竞选阶段，地方贪官与黑社会相勾结通过买选票加暴力威胁等方式，威逼利诱选民给他们所属意的候选人投票，这不是很正常吗？这还是比较文明的。比较不文明的，对于真正主张民主、敢于挑战地方贪腐势力的候选人，黑社会对他们直接实行“人间蒸发”，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吧？

其次，在选举和选票计算阶段，需要有人组织投票、计票吧。如果这些人是由现在的贪官领导下的政府组织的，是不是很容易受各级贪官操纵呢？即使选举组织表面上是中立的，要对组织选举的工作人员搞一些威逼利诱的伎俩，无论是腐败官员还是黑社会都应该很在行。

假设，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发生了很多不可能发生的奇迹，终于产生了能够基本反映人民意愿的民主政府，这个民主政府怎么开展工作呢？你手下的警察、公务员，过去一向是在贪污腐败官员的领导下，自己也参与贪污腐败，并且与各种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能怎么办？能把他们都解雇了？不解雇他们，他们能服从民主政府的号令吗？中国官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的经验难道还不够丰富吗？一群有丰富贪污腐败经验的官僚，外加与他们串通一气的律师、学痞、黑社会大哥，要摆平几个“民选”的书生，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所以，哪怕只是要在中国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有一个最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现有的贪污腐败官员都被全部打倒或基本上打倒，地方的黑社会已经被全部或基本镇压并清理干净，公务员队伍经过清理和改造。

但是，要实现以上这几点，哪怕是其中一点，不经过一次十分广泛的、彻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革命，又怎么可能呢？换句话说，不经过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难道会仅仅满足于空洞的资产阶级民主吗？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还要把政权归还给资产阶级，凭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何德有何能？

让我们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确实发生了广泛的人民革命，确实将全部或大部腐败官员打倒，难道他们通过非法私有化和腐败获得的私人财产还能够“神圣不可侵犯”，难道人民还会承认他们的财产受所谓“物权法”的保护，难道革命的人民不会断然没收其全

部财产并收归人民所有，难道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把这些已经收归人民所有的巨额财产再重新私有化？

如果确实发生了广泛的人民革命，并且确实将全部或大部黑社会加以镇压和清理，难道对那些长期与这些地方黑社会相勾结的大量私人资本家不应该同样进行镇压和清理吗？对于他们的血汗工厂和黑砖窑，难道不应该一概予以关闭或由人民予以接管吗，这是不是就严重地触犯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但是如果不触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其它的起码利益又怎样保证呢？

在对外关系方面，如果确实发生了广泛的人民革命，新的反映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难道还能够像旧的“共产党”政府那样对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侵略继续扮演不闻不问甚至为虎作伥的角色？难道对于旧政府所签订的诸如“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等牺牲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不应该一概加以废除吗？如果这样，那岂不是又严重侵犯了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的利益？

总之，在今天中国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如果不真正地、彻底地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并清除资产阶级的其它一切剥削人民、镇压人民的工具（如黑社会），就不可能有哪怕是形式上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是，人民群众一旦充分发动起来了，旧的国家机器一旦打碎了，那么革命就不可能人为地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界限内，而是必然极大地超越这个界限，革命的逻辑必然指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必然胜利？

“左转”论和“民主革命”论，在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立场观点在左派队伍内部的反映。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员加入到左派队伍中来，他们一方面同情无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不十分相信无产阶级真的有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力量，或者仅仅是口头上相信而心里实际上不相

信。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终究是“弱势群体”，终究不如资产阶级、官僚、媒体、学者有力量。

面对这样的矛盾心理，很多尚未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派同志就不得不努力寻找其他的、在他们看来比较有力量的政治势力。对于“左转”派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对于“民主革命”派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党内“改革派”以及小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

以上的分析表明，这些所谓的力量，都是靠不住的；不仅靠不住，而且如果无产阶级真的去依靠他们，是必然要吃大亏的。

那么今日与未来之中国，究竟谁比较有力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以及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并且必然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的，中国也不例外。

但是，考察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发展和壮大的结果，可以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前途，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时候，无产阶级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前途，也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结果，那就是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无产阶级获得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但是从此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目标。

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中国的工人运动将会走向哪种前途呢？是改良的前途，还是革命的前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实际的、客

观的历史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相对繁荣时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核心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积累了巨额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可以将这些超额利润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搞一些社会福利，以此换取本国的无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就是改良主义一度风行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到了 21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整体衰落并且正在进入新的总危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空前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连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福利国家都已经全面破产，资产阶级疯狂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像中国这样的为跨国公司打工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搞所谓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呢？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改良，那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一些有限的让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无产阶级增加一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利，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改良要成功，有两个前提，第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必须是有限的，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危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第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又必须是充足的，要能够相当程度地满足无产阶级依据其当时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所能够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才能够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稳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些让步既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又超出了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那么，改良就失去了客观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只能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能力满足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未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化解于一系列的改良之中呢？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本钱，更没有必要决心和远见，因而不可能将中国未来阶级矛盾的发展限制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

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名不正，言不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反革命、复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对劳动人民在几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积累起来的全民和集体财富的非法侵占。一旦中国的工人运动高潮来临，一旦人民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必然要求要对历史上一切非法的私有化进行清算、要对一切腐败官员非法积累的财产进行清算，而这些是中国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第二，中国的资产阶级靠贪污腐败起家，因而极端自私自利，又贪婪吝啬。搞社会改良的大前提，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有效地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强迫资产阶级的个别成员做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以保障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中国的现状是，贪污腐败已经完全泛滥和失控，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既没有任何的资产阶级集团愿意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而牺牲，所谓“中央”也早就丧失了约束资产阶级各集团、各派别的能力，更不必说动他们的“奶酪”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中国资产阶级确有能力和本钱，可以搞改良，任何严肃的社会改良都必然由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而胎死腹中。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基本矛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无非是以下三个条件：一，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出口（以此获取外汇，用来进口高技术设备和资源、能源）；二，对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以此来取得高剩余价值率和高利润率）；三，对能源、其它资源和环境的疯狂掠夺和破坏（用遗祸子孙后代的办法来获得眼前利润）。现在，这三个方面已经全部难以为继。

随着美国、欧洲、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发展和加深，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停滞并正在酝酿更大的危机。这样，中国原有的出口市场就将逐步停滞甚至开始萎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必然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的经济要求，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工资的增长会逐步追上甚至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再者，中国资本主义对于跨国公司的高技术设备的依赖以及对于海外的能源、资源和粮食的依赖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不仅如此，由于国内能源和其它资源的枯竭以及农业的停滞，中国对进口能源、资源和粮食的依赖将越来越大，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将越来越

越高昂。这样，一方面，市场停滞和萎缩，另一方面，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又迅速上升，并且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资本家的利润必然遭到挤压，从而面临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利润是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利润率下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引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危机，从而为未来革命形势的来临造成有利的客观条件。

如果说，改良主义的路走不通，是死胡同，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总结一下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夺取了政权。但是，在城市的国营企业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制度，城市无产阶级的力量仍然比较强大。这个时候，以邓小平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积其多年的反革命政治经验，为资本主义复辟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

党内走资派对于城市无产阶级没有采取正面强攻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迂回包围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基础比较薄弱的农村首先取得突破。利用部分农民群众残留的小私有者意识，走资派首先搞垮了人民公社，因而获得了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通过对这些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得以迅猛发展。城市无产阶级则逐步被孤立，劳动待遇比较好并且负担很多社会成本的国营企业在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于小资产阶级采取了拉拢的方法。他利用当时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仇视，以及小资产阶级贪图眼前利益的投机心理，拉拢小资产阶级为他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在 1989 年被邓小平“教训”了一次以后，小资产阶级右派很快就忘却了他们与邓小平以往的恩怨，完全投靠了资产阶级，积极地鼓吹全面私有化，参与了对城市无产阶级的进攻。

到了九十年代，新形成的资产阶级已经与小资产阶级右派组成了巩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中外各种私人资本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城市无产阶级被完全孤立，而且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终于毫无顾忌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将几千万工人阶级赶下岗，使他们沦为赤贫。这样，资产阶级就取得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胜利。

从这里可以总结哪些经验教训呢？资产阶级是人，不是神，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在资产阶级羽毛未丰的时候，它也不敢对无产阶级正面进攻。但是，通过采取正确的反革命战略，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自己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又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瓦解了无产阶级，这才取得对无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发展壮大，而且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资本主义发展自身正在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教育，中国的老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所谓老无产阶级，即与社会主义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国营企业的无产阶级，“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下岗。他们受过毛主席教育，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分析问题，能够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他们深受资本主义复辟和私有化之害，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阶级，他们都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向往社会主义。

很多老无产阶级都参加了反私有化的斗争。老无产阶级虽然年龄较大，但他们有很高的觉悟，而且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正在对他们的后代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老无产阶级的后代集中在城市，有的则集中于现存的国有企业。由于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部门，一旦将来条件成熟，老无产阶级的后代将发挥出远远超出其人数的巨大政治作用。

与老无产阶级相比，来源于农村、被称为“农民工”的新无产阶级人数巨大并且迅速增长。但是，新无产阶级的觉悟水平和组织水平目前普遍较低。然而，这是一个暂时的状况，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无产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壮大并且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和积累斗争经验，一旦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爆发，新无产阶级将成为一支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

在一定阶段，新无产阶级将不仅有愿望而且有能力提出一系列改善自身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地位的要求，诸如八小时工作制、自由组织工会、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等。但是，如上所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将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远见来满足新无产阶级的要求。当新无产阶级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工人斗争，但是他们的要求却无法在现存社会制度中得到满足的时候，新无产阶级的斗争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新无产阶级和老无产阶级虽然历史来源不同，但是本质上都是无产阶级，新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则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新老无产阶级能够完全团结起来，而老无产阶级的先进觉悟能够在其中发挥领导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将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再来看小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小资产阶级曾经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但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贫富深化的加深，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已经相对和绝对贫困化。这就造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分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开始赞同左派观点，在政治上向无产阶级靠拢。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临，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无产阶级化，小资产阶级有可能大部在政治上倒向无产阶级。同时，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也会深化，其内部的争斗甚至会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完全崭新的政治局面。一方面，以老无产阶级为核心，无产阶级将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只要无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治策略，就一定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一个十分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盟。而资产阶级则将被完全孤立，并且陷于其自身深刻的矛盾而无法自拔。

只要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无产阶级就将取得对资产阶级的完全优势，并必将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试看来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是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社会主义？——评项观奇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

李民骐（2011年11月8日）

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追求真理，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队伍的内部，为了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寻求劳动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应该进行广泛的、充分的、坦率的讨论，也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由于各人在社会实践方面的经历不同，对马列毛原理的理解有差别，与工农的结合程度有深浅，各自的观点出现一些分歧是正常的。

但是，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分歧，原则性的分歧和非原则性的分歧。只要都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但是因为具体看法不同、策略主张不同而产生的分歧，总得来说，都属于次要的、具体的、非原则性的分歧。比如在一部分马列毛主义同志与乌有之乡的一部分同志之间关于执政党的性质以及转变的可能性存在着分歧。但是，当个别人跳出来明目张胆地支持资本家进中央的时候，他就遭到了包括绝大多数乌有之乡同志在内的广大马列毛群众的批判。这就说明，绝大多数乌有之乡的同志归根结底是要社会主义的，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因而他们与另外一部分马列毛同志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同一个营垒内部的分歧，是属于策略性的、非原则性的。

读了项观奇同志最近的几篇文章：“支持总理倡议、果断启动政改”；“到底谁是极右派、西化派、资改派”；“要突出路线这个纲”。不得不说，项观奇同志在这几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项观奇同志经常说到“路线”，从路线上来说，项观奇同志是犯了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本质与当年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一样的。这是原则性的分歧，是不能含糊的。

项观奇同志是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老同志，对于马列毛术语是熟悉的，很多错误的观点往往与正确的词句夹杂在一起。项观奇同志的文章一般篇幅又都比较长，思绪

比较多，要从中理出脉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反复阅读项观奇同志的文章，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主要观点。

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项观奇同志认为中国目前属于“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上属于不彻底的资本主义、政治上属于“法西斯专制”，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与中国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相比较，所谓“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因此，项观奇同志主张，“当前的首要历史任务是争取人民民主”，“反对专制，走向民主，这是打击修正主义要害”，并且认为这是可行的，因为前苏联、东欧、台湾据说就实现了比较进步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其中台湾还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可能性不但有、而且很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项观奇同志认为，可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

当然，项观奇同志仍然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认为在世界上资产阶级仍然占绝对优势，走社会主义道路“很艰难”，因此最多也就是搞成个“半社会主义”。

项观奇同志高度评价某位中央领导，认为在“目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他是“谈论中国问题最深刻的一个”，“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揭露是符合实际的，他反复提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要求，是要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按照项观奇同志的说法，这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远远走在了薄熙来的前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担着风险，受到反对，首先是党内修正主义的反对。”

项观奇同志认为中国问题的要害是“政治”。政治当然是要害，但是项观奇同志所关心的“要害”恐怕不是政治的实质（也就是哪个阶级专政）而是政治的形式（也就是阶级专政的具体手段和表现形式）。项观奇同志的观点虽有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只要是“专制”的形式，不论其它，一定是最坏；而只要是“民主”的形式，不论其它，一定比“专制”更好。

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来说，今日的中国，劳动人民固然是被压迫、被剥削。但是劳动力可以自由买卖呀，资本家可以自由剥削呀，还可以自由造假呀，这算得上封建法西斯吗？与民主的印度、民主的俄罗斯、民主的东欧、民主的东南亚、民主的非洲、民主的拉丁美洲相比，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不见得更受压迫、更受剥削，中国的腐败也不见得更厉害，中国的政府也不见得更加专制。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这个略有不同，一是历史上工人阶级斗争的成果，但是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残酷地剥削广大的第三世界再用其剥削来的超额利润给工人贵族分一杯羹的结果。这种雅典式的民主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即使这种雅典式的民主现在也已经苟延残喘。现在的世界形势，根本不是项观奇同志所说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正在流行。恰恰相反，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早已经垮台，就是其残余现在也处于最后瓦解的过程中。当今的世界，不是社会主义很艰难，而是资本主义很艰难。

在资产阶级民主日薄西山的今天，项观奇同志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有进步性，我们应当补民主的课，搞社会主义也只能是“半社会主义”。这里有个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半社会主义”呢？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形式上也是“一党专制”，是不是还不如台湾的“三民主义”呢，是不是也需要进步到资产阶级民主呢？

既然在二十世纪中期，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什么就不能创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呢？当然，历史不能重演，今天不会也不应当照搬过去的模式。但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大锅饭、铁饭碗、人民公社，这些都是为过去历史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从根本上对劳动人民有利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先把这些恢复起来，走一段回头路，打好了基础再创新，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我们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必须继承巴黎公社、苏维埃还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进历史经验，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一切形式的走资派扼杀在萌芽之中。但

是，所有这一切的大前提，是无产阶级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有的同志会认为，我们现在搞点改良，先不要“好高骛远”，先给人民争取点自由民主权利，有什么不好呢？这些同志有必要考虑一个问题：既然这个自由民主这么好、对劳动人民这么有利，可以一步一步引导着资产阶级把作为“要害”的政权交出来，没有了这个“要害”，“修正主义”据说就垮台了；那么，难道资产阶级是傻瓜吗？你项观奇同志一要求，或者左派一呼吁、一游行，人家就把“要害”交出来了？明明是与虎谋皮，项观奇同志还认为自己不是好高骛远。

当然，在项观奇同志看来，某些中央领导乃至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是真心实意地相信普世价值的。让笔者怎么说呢，这种政治天真与陈独秀先生倒是可有一比。陈独秀先生是个好人，但是他的先搞“国民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几乎无可挽回的损失。

项观奇同志所主张的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先争取点自由民主的政治路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没有实践过啊，殷鉴不远，二十二年前而已，为此中国的无产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个血的代价，必须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负责。血的代价，付一次就可以了。

俄罗斯、前苏联其它地区、东欧的无产阶级也是跟随资产阶级民主派搞了民主啊，社会主义的成果全部丧失，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沦为与第三世界为伍。当然，在项观奇同志看来，因为这些国家搞了民主，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相比起“修正主义”仍然是“进步”？

我们要争取改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每天都在进行的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都是争取“改良”。国企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私企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待遇的

斗争、一般劳动群众反对资本家假冒伪劣的斗争，都是改良性质的斗争。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不仅必然越来越广泛，而且必然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这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纸上给与劳动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多了（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可以当真的，这是政治常识，也是中国社会的常识）；而是因为，中国与世界的总的阶级力量对比在向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方向发生着变化。

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重庆模式”的历史地位。重庆模式发生了，固然不是如某些左派同志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但更不是如项观奇同志所说的，是什么在“专制”下搞“社会民主”，还不如“普世价值”。

项观奇同志所赞赏的那位中央领导，好话说了很多很多，但是说得实在太多了，演技又实在并不很高明，以至于观众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曲终人散之际，项观奇同志上赶着来捧场，实在是有些不合天时。至于项观奇同志此文一发，在左派内部引起的种种不良反应，自然是地利人和皆失，殊为不智。

这位中央领导有哪些政绩呢？他确实对于一部分群众给了一些小恩小惠，但那是慷国家之慨。他更可以慷国家之慨，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转基因，开放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部门，对“民营”资本家那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但是，何曾见他动过跨国公司和资本家哪怕一根汗毛？

相比之下，重庆模式好歹杀了几个贪官、杀了一批黑社会。老百姓可以过几天不提心吊胆的日子。最主要的，在中国现在的许多地方，贪官和黑社会就是地方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权基础。杀了他们，就是对一部分资产阶级实行了专政，这才引起了全国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的极大不满。

重庆模式的实践，标志着资产阶级的重大分裂。少数优秀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民心可用、民心不可违。马列毛最深厚的力量在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资本主义复

辟的时间越久，广大劳动人民就越是觉醒、对于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怀念就越是强烈，资产阶级就越是敢改旗易帜。

毛主席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个紧箍咒。中国的资产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很想把这个像一摘了事，但是实在是不敢；而且越往后，劳动人民就更加觉醒，毛主席的像就更加没人敢摘，牢牢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稳当得很。

笔者衷心地希望，项观奇同志能抛弃自己错误的观点，回到真正的马列毛的立场上，与广大的马列毛同志一起，争取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关于重庆模式要做好两手准备

远航一号（2011年11月20日）

读罢秦仲达老部长的呼吁书，触目惊心。如果是以劳动人民的根本福祉为目的，如果是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项目计划部门是根本不会考虑立项的。但是中国的现状，就是资本和利润占统治地位，这个项目当然要反，能反掉最好。但是即使反掉了，照样会有成百上千的类似的项目。中国正在建设的几千万千瓦的核电站都是潜在的危险源、爆炸源。

这件事情暴露了重庆模式的一个根本矛盾，那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搞改良的根本矛盾。在中国现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模式对于劳动人民还是有一些不大但是确实的好处的，对于马列毛的发展也是有利的。所以，我建议广大左派同志做两手准备。

好的准备。是经过广大左派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对重庆市主要领导陈以利害，力挽狂澜，将这个工程完全停下来。这是有利的情况，如果做好了，既可以避免民族的大灾难，客观上也可以大大提高重庆市主要领导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于该领导、于左派在政治上都极其有利。

但是，更要准备坏的情况。以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来说，坏的情况发生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尽管有全国人民的反对，重庆市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仍然无法将工程停下来，而主要中央领导采取装聋作哑的办法、逃避责任。将来一旦出了事，除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人民蒙受无法预料的灾难以外；在政治上，反动派、右派很可能借机疯狂诋毁重庆模式。他们不会去批评德国的跨国公司，而会将屎盆子全都扣到现在的重庆市领导头上，归结为“政府决策”失败，从而进一步疯狂地推动私有化。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这件事，除了重庆市领导的责任以外，首先是跨国公司为了牟利而从不吝惜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万一将来有事，大家不要

忘记，秦仲达老部长是直接向现在的主要中央领导呼吁了，并且明确提出主要中央领导不签字工程不能上马。所以如果工程最后还是上马了，并且造成了现在无法预料的后果，那么现在的主要中央领导应负主要责任。

最根本的，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要不改变一切为了利润的腐朽的生产方式，这样的危险和悲剧，不仅不能根绝，反而必然愈演愈烈。

重庆模式与化工工程的矛盾，对于左派还可以有另外的启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搞改良，想给劳动人民做一点好事，是很不容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做好事，就要花钱。要花钱，就要有财政收入。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政收入不还是要靠资本家，不还是要靠招商引资。没有招商引资，五个重庆岂不就成了水中镜月、空中楼阁？

有的同志要问，为什么不可以投资国营企业呢？国营企业好是好。但是你国营企业一要遵纪守法，二不能克扣工人工资、还要给工人应有的福利待遇，三不能偷税漏税，怎么能和为了牟利可以不择手段的所谓“民营企业”竞争呢？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依附性的，是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的。重庆市领导纵使有天大的政治才能，他们也不是神仙，也不会变魔术，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技术条件一下子就改变重庆市经济在高技术方面对外依赖这个基本事实。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要想突破低水平竞争，要想稍微增加点附加值，不引进外资，又怎么办？

我们今天探讨这些问题，不是纯粹学术的，也不是单纯探讨重庆模式。将来中国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要从地方开始。那时候，遇到的矛盾，将是十分类似的。即使劳动群众掌握了地方政权，经济怎么办？继续搞制造业加工？那你如何竞争得过台湾、广东、浙江那些黑老板？

幸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一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都是高度依赖能源的。开采能源不需要高科技，而没有能源高科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能源集中在西北部，而不在东南沿海。与制造业不同，能源是可以垄断的，是可以产生高附加价值的，既可以使工人享有合理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又可以为地方政府创造充足的财政收入，用来给人民办好事。只可惜，现在中国西北的广大资源都被煤老板侵吞浪费了。

如果重庆模式能够推广到西北各省，如果现在被煤老板侵吞浪费的资源能够收归人民所有，为人民所用，那么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过渡就很有利了。

什么是所谓的“宪政民主”？

李民骐（2011年12月7日）

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左派论坛讨论中，经常有人提出左派的任务就是首先争取所谓“宪政民主”，还有人说什么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宪政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对于了解所谓宪政思想及其渊源的人来说，听到这种说法，未免啼笑皆非。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宪政民主”，而只讲过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所谓宪政民主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的说明来自维基百科，还是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所谓“宪政主义”的思想：

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又称立宪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也是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的现状。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宪法强调法律具有凌駕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的法治（rule of law）的必要性。

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即有限政府），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可见，所谓“宪政”的关键，是以宪法来约束国家权力，请注意，也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濫用。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所谓“宪政民主”的说法指的是用“宪政”来约束民主。

对有些不明就里，人云亦云喊什么“宪政民主”的左派“积极分子”，有必要普及一下宪法和政治学方面的常识。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宪法，但是对于宪法的理解是根本不一样的。我国宪法在历史上是由社会主义宪法演变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仍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据我所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一般都没有这样一条。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由于奉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认为人民权力高于一切，而宪法是派生的。人民民主高于宪法。在人民民主前面再加个什么“宪政”，不仅画蛇添足，而且是根本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基本精神的。

那么，资产阶级民主为什么都要把他们自己的民主叫成是什么“宪政民主”？既然已经“民主”了，还要“宪政”约束干什么？

中文维基百科对于这个问题还算是做了比较准确的解释：

宪政主义体现了对人类自由选择 and 深思熟虑的充分自信，它根源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法传统、基督教传统以及契约论传统，汲取了西方法治理论、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等理论的精华，形成了“权利”与“权力”两个重要的维度。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指出宪政的实质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

人类能否在自我管理的同时实现自我约束一直是困扰着宪政主义的一个难题。由于突出了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民主权力的限制，宪政主义倾向于保守，造成了宪政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这种紧张突出反映在人民主权与限权宪法之间的冲突、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等方面。

宪政本身并不涉及民主，宪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权；而民主则关注政府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来源。宪政可以让政府受到约束从而保障公民自由权；民主则可以让政府执政为民，从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权。因此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宪政的关键词是“自由”，民主的关键词是“平等”。

这就是说，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宪法高于政府，因而也高于民主。民主只不过是产生政府的一种形式。宪法是第一位的，而民主是派生的，所以才叫做“宪政民主”。

那么，宪法本身的来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宪政主义所说的所谓“自然法理论”。所谓自然法理论说的是，有那么一些上帝所赋予的、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法则；这些法则高于一切人间的法律，一切人间的法律都必须服从自然法。（请读者注意，在欧洲启蒙时代，“自然”不是指的大自然，而是指的上帝赋予的，用中国话说就是老天注定的。）

那么，根据所谓的“自然法”，人有“天赋人权”（现在叫“普世价值”），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那么，财产明明是后天得来的，为什么财产权也算天赋人权呢？同志们要是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可别笑掉大牙。根据洛克的理论，财产是劳动创造的，而劳动是人的身体的产物，因此财产可以看作是人的身体的自然延伸。

今天的右派思想家一口一个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不知道根据他们老祖宗的理论，如何能论证出中国资产阶级的各种“物权”是他们身体的“自然延伸”。

无论怎样吧，西方资产阶级为何要用宪法来约束民主呢？这是因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西方各国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西方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劳动人民得到民主权力以后会实行“多数暴政”，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为了避免多

数暴政，保护所谓“少数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给民主套个紧箍咒，这就是所谓“宪政”。

（顺便说明一下，在政治理论和宪法中，“权力”和“权利”是有严格区别的。权力指的是主动完成一定行动的能力；而权利指的是不受他人（包括政府）干预做某事的自由。所以，国家有“权力”，而公民有“权利”。请读者在平常写作时注意区分，不要混淆）

美国宪法在这方面很典型。美国宪法的设计从一开始所根据的原则，就是如何既具有共和国的表象，而又不让人民大众实际上拥有民主权力（但是可以有民主“权利”，或政治自由）。为此，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其中，行政部门（总统）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并且因为选举人制度的关系，选票的分配使小州可以得到比人口比例更多的选举人票，而大州只能得到较少的选举人票，违反了平等选举权的民主原则。立法部门分成两院。其中，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的，但是参议院不是，又违反了平等选举权的民主原则。司法部门完全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并且法官可以终身任职。由于美国司法体系的判例制度，法院实际上拥有部分立法权；最高法院还拥有宪法解释权，可以宣布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所通过的法律违宪。因而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司法部门可以凌驾于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上。

美国宪法根本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民主的宪法。有人居然还将“三权分立”当成什么民主制度的范例，实际上是无知到极点。

所以，所谓“宪政民主”本身就是资产阶级专门为了限制人民民主权力而设计出来的反动制度。现在一群号称左派的所谓“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居然也鹦鹉学舌地在说什么“宪政民主”，甚至还有“无产阶级宪政民主”，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那些主张所谓“无产阶级宪政民主”的人，请问，你的宪法的根据何在，法律源泉来自哪里？如果是无产阶级民主高于宪法，何必画蛇添足？如果是宪政高于无产阶级民主，那么是不是在一个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隐藏着一个“无产阶级自然法”？

本人殷切期待着这个“无产阶级自然法”的重大发明。

列宁为什么要驱散立宪会议？——就宪政问题答项观奇同志

李民骐（2011年12月7日）

感谢项观奇同志阅读拙作“什么是所谓的宪政民主？”并提批评意见。仓促之下，做几点简单的答复，并就一些问题表明态度。

第一，项观奇同志认为我“学风不够端正”、“口气大得没边”，态度不够和缓，没有以理服人，属于以势压人。项观奇同志并且分析，是我的“出身”，具体说即参与过八九民运，可能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立场和思想观点。

项观奇同志的分析非常正确，我参加八九民运的经历确实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立场和思想观点。正是在二十二年前，我亲身经历了、亲眼目睹了，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失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在政治上处于无组织无方向的状态，因而盲目地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去争取什么“宪政民主”，为自由派火中取栗，付出了血的代价。仅仅数年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就与官僚资产阶级言归于好，发起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几千万工人阶级从此失业下岗。

正是这段经历，才促成了我抛弃自由派的反动立场并逐步接受了马列毛的正确立场。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才认为，像二十二年前那样的悲剧决不能重演，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决不能再跟着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去搞什么“宪政民主”？

事关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问题，原则问题，马虎不得，也客气不得。以理服人可以。态度和缓，恕难从命。

第二，问题的核心是人民权力高于宪法，还是所谓宪政高于人民权力？这是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的重要区别。

如果是承认人民权力高于宪法，那么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十分清楚，明确地表明了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加上“宪政”二字何益？如果如项观奇同志所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同义反复，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

将“宪政”二字加在民主前面，无论是在汉语还是任何其它语言中，都是修饰词，就是表示限制和制约。既然宪政是用来制约民主的，它势必要有独立的法理来源。对资产阶级来说，这个法理来源就是所谓“自然法”和“天赋人权”，实际上就是不许触动资产阶级的财产权。那么，对无产阶级来说，这个独立于人民之外的法理来源又是什么呢？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有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所谓“自然法”和“天赋人权”吗？

第三，项观奇同志认为，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搞“宪政”，这不能不说在政治上是十分天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说个人、集团、政党凌驾于宪法之上，那就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的阶级力量对比不足以防止个人、集团和政党超越宪法条文之外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实际的阶级力量对比，决不可能因为改一改宪法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宪法只能总结和反映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而决不能凭空创造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对比。

就以项观奇同志赞赏的孙中山先生来说吧，他搞的《临时约法》怎么就约束不了袁世凯呢？孙中山难道不想搞宪政吗？孙中山搞了那么多革命、护法运动，最后都失败了，最后还不是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发动工农，国民党才有了起色。

第四，项观奇同志以及另外一些同志，从毛主席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写的文章中，摘出这么一句，“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显然，任何事情，包括主席的话，都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去理解。1940年的时候毛主席和共产党赞成“宪政”的说法，那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了争取民主人士的理解。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的

时候，就不再使用“宪政”这个说法了，而是使用更加准确的人民民主专政；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就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

既然项观奇同志从毛主席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讲的一些话中找根据，那么我也不妨讲一个特定历史情况。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工兵代表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不过，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想法仍然不成熟，仍然按照十月革命以前的计划在全俄国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布尔什维克党在城市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获得了多数票。然而，由于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社会革命党控制了农村，在整个立宪会议中，社会革命党的议席占大多数。如果按照形式民主和宪政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党岂不是应该乖顺地将政权拱手让给在立宪会议中占大多数的社会革命党？

在这样紧要的历史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应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立宪会议拒绝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以后，于1918年1月果断地驱散了立宪会议，捍卫了苏维埃政权，从而避免了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又将政权交还给资产阶级的历史悲剧。这个故事对于哪些迷信“宪政民主”的同志来说，是不是该有一些启示呢？

最后，因为项观奇同志的文章提到一枝清荷同志，那么我也表个态。我完全赞成一枝清荷同志在“我是属于哪一派”一文中所阐述的立场和观点。我认为，一枝清荷同志准确地、精辟地概括了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问题的基本观点，故特将相关段落摘录如下：

在任何阶级社会的任何阶级中，民主作为一种手段，都是用来团结本阶级的力量，用来与其他阶级的斗争。而国家作为某一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用于镇压其他阶级的工具，必然要体现这样一种民主。宪政和代议制的民主，很明显地就是资本主义上升为统治阶级后的民主形式。那么被统治的无产阶级，在这样一种民主形式下有丝毫自由么？不可能的。在宪政民主下的工农，就像风中的浮萍，无根而任人宰割。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过无数遍的道理。在我们走社派看来，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是工人的统一意志，就是铁和血，我宁愿用专政这个词来表达我们的民主。在这样一种专政（或者说民主）下。工人的统一意

志，直接管理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那些拥有自由意志的学者们又要不开心了，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子，只能先作为无产阶级的奴隶，被迫为无产阶级提供专业类的服务，直到被教育好，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因此，我们所要的民主，就是工人的团结，工人的组织，以及对工人的教育，直至最后工人的统一意志成为国家意志。我们所要的民主，和走资派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有丝毫共同之处么？答案是：没有。我们跟走资派的斗争，算是内斗么？答案肯定不是。

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

彭凌璨（红色中国网 2011 年 12 月 11 日转载，发布者：黑夜里的牛）

远航一号注：在整理红色中国网旧文时发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集中代表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各青年左派小组的一系列主要政治观点。在后来实际的阶级斗争中产生恶劣影响的若干重大错误观点，如“中帝论”、“灌输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等，在这篇文章中都有反映。

【少年中国评论原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斯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斯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斯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

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以下是共识部分：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宣传所赐，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无限抹黑，成为官僚、威权、僵化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形象则被无限美化，成为民主、自由、福利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是如此么？曾经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名词：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要用社会主义来装

饰自己。而历史上真实的资本主义，是生产线上加班的女工童工、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和资本家倒掉的牛奶、是国家警察与资本家护厂队枪杀罢工工人代表。这一切的改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建立起较为温和的可持续的剥削制度。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资产阶级的赐予，而是一次次的罢工和起义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换来的，总而言之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斗争的结果。

清除了以上概念被赋予的想象光环，我们可以认真审视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说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有一种病只有穷人才会患上，那么资本主义大概不会为他们生产相应的药品。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非常含糊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使用。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概念：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而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澄清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以下不得不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当今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改换名称为国有经济后，为大官僚所窃取，并改变为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改革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私有化，其中受益者主要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厂长经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意，变成了资本所有集体剥削劳动群众，而这种形式中，主要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事实上也是完全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譬如各种矿老板；而外资在全球金融越发紧密的今天，也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制方面，按资本分配早已取代按劳分配成为主流。新的阶级已经分化形成，在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完成后，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还有不为利润生产的行业吗？这一切事实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拜我们所受过的僵化教育所赐，帝国主义的形象，往往是大炮巨舰、法西斯、侵略、军备竞赛的同义词。事实上，这只是军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所处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这以前市场的购买力就已经饱和，所以它必须进行扩张，乃至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以武力形式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20 世纪初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共和国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辩证逻辑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消耗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一方面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验证：资本主义阵营被美帝所统一，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就业问题，然后在国际间实行利润倒流，允许小弟们搞工业且放开国内市场任其冲击，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工人待遇，也因此缓和了阶级矛盾。最后就是军备竞赛，过剩的生产力用于攀科技，以至于冷战期间还顺带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拥有最多潜在工业人口的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开始。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中国向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1979年2月到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奉上了投名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启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最后有了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和负债大王美国，期间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插曲，可惜对于世界资本来说，中国的庞大的工业人口已经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直到本世纪头十年才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此回到开头那句话，2008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衰落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落了，法国工人大罢工、英国学生与无业者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也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是相比腐朽到骨子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并且向世界彰显了帝国主义的力量：4万亿人民币救市与1.5万亿美元债权。

更详细的经济数据可以列举很多，在垄断程度上，我们可以看看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在此仅举银行业一例（在此感谢马列毛主义论坛提供的资料）：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类机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50.9%、15.0%和11.0%。

——《银监会 2009 年年报》

根据各主要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重要城市商业银行）的 2009 年年报，官僚资本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 10 家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可以控制约 47.4 万亿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60% 左右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而官僚资本则是大股东，实质上拥有控股权，能够控制 10 万亿以上的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12.4%

邮政储蓄银行约占 3.43%，也属于官僚资本，以上三部分官僚资本已经达到 75%。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中也必然有大量官僚资产，所以全部官僚资产所占的比例会达到 80% 以上。

只有少数银行如：宁波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中的民营资本比例较高，但不足于实质控股，而且这些银行的资产也只有 2 万亿左右，约占 3%。

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但股份都没有超过 20%，远达不到控股的程度，

所以国内银行没有一家被外资控制。而外资银行的资产只有 1.35 万亿，约占 1.7% 左右，比例很小。

从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来看，根据《2010 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数据如下：

一、基础工业数据:

- 1、粗钢产量: 6.27 亿吨, 同比增长 9.3%, 占世界总产量的 44.3%, 超过第 2-第 20 名的总和;
- 2、钢材产量: 7.98 亿吨, 同比增长 14.9%
- 3、水泥产量: 18.68 亿吨, 同比增长 15.53%, 占世界总产量的 60%;
- 4、电解铝产量: 1565 万吨, 同比增长 21.4%,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 65%;
- 5、精炼铜产量: 457 万吨, 同比增长 10.6%, 占世界总产量的 24%; 进口 429 万吨, 消费当量达 880 万吨,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 50%;
- 6、煤炭产量: 32.4 亿吨, 同比增长 8.9%, 占世界总产量的 45%;
- 7、原油产量: 2.02 亿吨, 同比增长 6.9%; 进口 2.39 亿吨, 同比增长 17.4%; 表观消费量达 4.39 亿吨;
- 8、乙烯产量: 1418.9 万吨, 同比增长 31.7%, 世界第二(美国第一); 当量消费 2400 万吨, 自给率约为 59%;
- 9、化肥产量: 6740.6 万吨, 同比增长 5.6%, 占世界总产量的 35%;
- 10、塑料产量: 5550 万吨, 同比增长 20.9%, 占世界总产量的 20%;
- 11、化纤产量: 3090 万吨, 同比增长 12.44%, 占世界总产量的 42.6%;
- 12、玻璃产量: 6.3 亿重量箱, 同比增长 10.9%,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 50%

二、工业产品数据:

- 1、汽车产量: 1826.47 万辆, 同比增长 32.44%, 占世界总产量的 25%;
销量 1806.19 万辆, 同比增长 32.37%, 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 1750 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 2、船舶产量: 造船完工量 6560 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54.6%, 占世界总量的为 41.9%;
新接订单量 7523 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290%, 占世界总量的 48.5%;

手持订单量 19291.5 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 40.8%；

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 2009 年有较大提升；

出口额首次突破 4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07%。

3、工程机械产量：5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占世界总产量的 43%（工程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凝土泵、叉车、压路机等）

4、计算机产量：2.46 亿台，同比增长 35%，占世界总产量的 68%，份额比 2009 年提升 8 个点；

5、彩电产量：1.18 亿台，同比增长 19.5%，占世界总产量的 50%，份额比 2009 年提升 2 个点；

6、冰箱产量：7300 万台，同比增长 23%，占世界总产量的 65%，份额比 2009 年提升 5 个点；

7、空调产量：1.09 亿台，同比增长 35%，占世界总产量的 80%，份额比 2009 年提升 10 个点；

8、手机产量：9.98 亿部，同比增长 61%，超过世界总产量的 70%；份额比 2009 年暴增 20 个点；

9、洗衣机产量：6100 万台，同比增长 21%，占世界总产量的 44%，份额比 2009 年提升 4 个点；

10、微波炉产量：6800 万台，同比增长 12%，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11、数码相机产量：8200 万台，占世界总产量的 65%；

12、数字电视机顶盒：1.5 亿台，占世界总产量的 73%；

三、基础设施数据：

1、电力：新增装机容量 9118 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 9.62 亿千瓦（美国为 10 亿千瓦），同比增长 10.07%；

2、发电量：42065 亿度，同比增长 13.2%，占世界总发电量的 22%，首次超越美国（美国 2010 年约为 41100 亿度），跃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 100 多年了，发电量超过美国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3、公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 10.5 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到 398.4 万公里；新增高速公路 8258 公里，总里程达到 7.41 万公里（美国 9 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 4986 公里，其中客运专线 1554 公里；
投产复线 3747 公里；

营业总里程达 9.1 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速铁路 8358 公里。

5、能源：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32.5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6%，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四、轻工产品及其他：

1、纱产量：2717 万吨，同比增长 17.5%，占世界份额的 46%；

2、布产量：800 亿米，同比增长 6.2%

3、黄金产量：340.876 吨，同比增长 8.57%，世界第一；

从纱产量、布产量的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在世界纺织品的份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至于中国拟在海外建立的军事基地，瓦良格航母与歼-20 战斗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高铁大跃进的意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21 世纪初，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沿用日本游行者对它的称呼：中华帝国主义。

最后还需要澄清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美化，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得到超额利润的分红。事实上在一战前夕，无论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落后的帝国俄国，普通工农都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采用福利政策的原因，前文已经论述。有网友用一句话精确概括了这个现象：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

三、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在论述了上述两条共识后，关于社会矛盾的共识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搅在一起，首先是一个阶级性问题，这一点苏拉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说得比较有道理，不过我比较反对他文中流露出的民粹和反智倾向。我们这些左派的确都不是什么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者和实践先进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唯物历史中体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尖兵。然后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或许可以让直观体会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意义。

上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当然除了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想，事实上与一些人想的不同，80 年代初几乎没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过去扣帽打倒的右派和官僚平反了，工厂里取消鞍钢宪法推行厂长责任制，技术官僚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了，文革中政治挂帅那套不搞了，于是必要的物质刺激——奖金和福利让工人也高兴，在中央的推动下，一些将信将疑的农民也把土地分到了自家。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造反派。1989 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敏感词运动，运动的根源是物价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不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民主自由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提的，《人民日报》的著名社论里都这样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总爆发。在这之后，思想界很受打压了几年，直到南巡讲话才逐渐放宽。

90 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着的是国企改制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反复挑起事端、日本反复祭拜神社。这时候网上的愤青一边批判社会不公，一边抱怨着国家软弱。那时候在南方周末里还能读懂中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高举爱国旗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南周针对美帝炸我南联盟使馆事件的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而即便是如此，真正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即使在民族矛

盾最为尖锐的 1999 年。学生们恐怕只记住了当年美帝使馆门前的散步喊口号仍东西，而 2000 年前后，国企的反私有化斗争和农村的抗税斗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提起。拿老工业基地东北来说，从 1997 年，国企改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上千万工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讲的都是那时候的故事。国企的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直到近年来反思才逐步兴起。但是三农问题就不一样了，在 2004 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的暴力抗税每年多达数十万起，也有很多学者是靠做这方面研究起家的，比如现在变成右派的于建嵘，中间派的秦晖，左派的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能在网络上意识到民怨问题，有一拨最为反动的所谓左派，时而炮制阴谋论、时而祭出毛泽东大旗，动辄扣人以“汉奸”“带路党”帽子，试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不但理论批判让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欧美日逐渐衰落铁的事实也将撕破他们的画皮。

说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最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时间段都过于保守，毛泽东晚年就提出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甚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阶级矛盾或许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此就不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了。

四、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将要到来的战争
不是第一次。在它以前
有过其他的战争
上次战争结束时
有胜者也有败者
失败者那里，贱民们在挨饿。
胜利者那里，贱民们也挨饿。

——布莱希特《德国战争课本》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写了一个大题目，看到这两个主义，隐隐有些头疼，这种题目系统地论述下来恐怕一本书都不够。而且又涉及到当前论战最尖锐的问题，稍有不慎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就把我淹了。好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社会性质的论述，并且考虑到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左派同志，将会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先界定概念，除特别指明外，本节所述的民族与国家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 **nation**。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 **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化，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形而上的民族国家主义，这一部分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一种道义上的绑架，从文化上来说，君主与宗教都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对君主和教会的忠诚。无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还是欧洲封建骑士，恐怕都是君要臣死臣 Facebook，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而事实上这个君王已经被置换成了国家。即便是日本与英国，如今君主对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缺乏现代性的国家，诸如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旦胜利，马上就要祭出伊斯兰教的旗帜，根本原因还是人们长期生活在部族中，缺乏对于民族国家基本的概念，不得不依靠宗教来强化新政府的统治。中国曾经的革命扫荡了君主和宗教，但统治者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全民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上，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是一种要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曾经无产阶级先锋队选择结束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他们不得不动用其他法统进行辅助，当前的新儒家兴起就是一例。右派在本世纪的启蒙中，喊出了一个“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不够有力，因为他们连国家这一概念的物质起源和文化起源都没有辨析清楚。

另一部分则是形而下的自然亲近情感，即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也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国家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群总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首先同一个阶级才会具有。有没有跨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专政，被统治阶级不免带有统治阶级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斗争。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

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无产阶级最需要提防的是资产阶级将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上升到对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上去。

民族主义辨析清楚了，逆向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不敌外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之后，产生了对外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人人网的圈 A 党魁巴赫金曾经开玩笑说：我群中心主义，相对的是他群中心主义，例如逆向种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对这种卑微的奴隶式的身份认同，源于对原初共同体认同感的彻底崩溃后替代以其他共同体的认祖归宗，应归因于智力上的不发展而无法产生对人类主体性与整体主义思维的批判性感知和超越。而这两个群体每天攻击来攻击去，你一个美分我一个五毛帽子满天飞，各自秀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不知与当年的“六九圣战”有什么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中的国家不是在固化而是逐步在消亡，这种爱国观的对象爱的不是那个想象或者被灌输的共同体，而是爱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心理与归属感的一个阶级兄弟姐妹。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话提炼这个观点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可能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口号心存抵触，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普罗大众。

五、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人是幸运的，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没有学习它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宣传机器还把“唯一科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标签粗暴地贴在马克思主义上面，引起人们的本能反感，可谓粉到极点就是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威力。

科学能解释世界，神学一样可以解释。但是科学可以改造世界，神学就不行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结论可以解释历史，而是因为在它的论证过程中，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客体性在于至今为衣食住行等“再生产”所迫，与动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人的主体性在于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本身，其斗争使历史流动起来，而不是空洞的时间。人既被当下历史条件所限制，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未来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科学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即用理论指导实验后，还能根据实验结果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这一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符合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不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要为个体的再生产而劳动。2.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空前强大，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谓武装到了牙齿。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我们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个时代已经有娱乐至死的趋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预言或许就要成真。

以上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起舞时最沉重的镣铐，看起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有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这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2.这是工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时代，尤其是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几乎是一个飞跃。3.互联网，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互联网在历史中将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于当前网络上错误的历史观做一个清算，只有树立了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实践。

首先是五毛的唯经济论，常见的说法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需要补课”、“现在搞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只能搞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这是典型的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观点中，人本身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意识和能动性，永远只是作为历史的客体随波逐流，与动物无异。“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这是历史内在的逻辑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但是可以选择“不通过”，这是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可以发挥的最大能动性。这种观点是官方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当前最为反动的一种历史观。

其次是草泥马与五毛之间的妖魔化历史和庸俗化历史，常见的说法有“感谢美军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文革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发起的”、“列宁是得梅毒死的”、“蒋光头才是得花柳死的”。在这一类言论的来源者眼里，历史是由极少数权力的掌握者主导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奉行这种极其唯心的精英史观，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权力上层那些鸡零狗碎的传闻。这类段子之间往往逻辑不能自洽，危害远低于唯经济论。但是它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进步的追求，流于分享转发段子的嘻嘻哈哈，这一点上看它也算是维稳先锋了。

最后是一种神化历史的唯心史观，较常流行于知识水平稍高的人群中，常见的是把前三十年夸成一朵花，后三十年贬成豆腐渣，以及陈丹青等公知的民国范儿。这些人并不是试图

解释历史，反而是在宗教化神化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历史，自然就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变革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不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运动，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阻遏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某些伟人和阴谋家私底下设计好的。当然这种历史观更容易反驳，把毛时代夸成一朵花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教育锻炼了一代人，却由一场宫廷政变，资本主义就轻易复辟了，而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在当时民间饿殍遍地的铁证面前，恐怕只会引人反胃。

人人网上好谈国事的青年，恐怕生成关键词，最大的就是“历史”了。左派青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一定要自身理论过硬，认真学习弄懂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有效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能避免造成自身一些偏执错误，避免一粉顶十黑的反面效果。

六、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当尔·恩·斯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权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当今在左派群体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反民主情绪，不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潮的方方面面根源，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主曾经是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在左翼未来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它还将一次次地被树立起来。而在此节中，或许还可以回答一个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难题。

错误观点 1：通常人们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不值得追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希腊，继承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普通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的政治诉求。

的确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但是官僚专制制度下，没有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没有进行罢工和散步的自由、无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宣传机构，其斗争条件比之西方国家“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不知恶劣多少倍。

与曾经共产主义运动时代的环境不同，今天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将是我们的“现代君主”——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助产士，而资产阶级民主也将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

错误观点 2：人民只需要改善经济条件，不需要民主权利。

这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已经被批透了，但是近年来又有沉渣泛起的态势。

人民对于政治不关心，与其说是天然如此，不如说是没有受到政治锻炼，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与愚民宣传下的结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喜欢看书，一个未经常体育锻炼的人喜欢宅在家里，这种解释更唯物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的确容易为蝇头小利收买而放弃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这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将来或许还将要发生。但是这不是因此歧视人民的原因，反而需要觉悟的左派同志反复重申这一原则：不要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

错误观点 3：民智未开而行民主，最后反而会坏事。

这一条有其道理，但是犯了与上一条类似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智慧，除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斗争而来的政治智慧，可以轻易秒杀书本上教条，这也是我对龚知宇之前诘问的回答，即左派青年为什么写文章老喜欢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首先他们是理论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斗争领袖，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接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老实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总引用一两百年前导师（包括毛泽东）的话，因为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差别太大。只可惜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可称得上导师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要最广泛地学习理论，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局模式，比如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仅仅是从列宁的《怎么办》中还不够，更需要阅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错误观点 4：民主是西方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

兰州烧饼

在一一驳斥了几种错误观点后，说个题外话，回答开头所说的跳出历史循环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跳出历史循环的追求，对于人类只是换一个高级的进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弥赛亚主义，终极拯救的想法最后只会导向对现世的悲观。作为一个真正懂理论的左派，要抛弃性善性恶的无谓争论，而是去发现善恶行为的物质基础，为改造这种物质基础而努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复辟，首先根源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拿中国历史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还存在着组织联合上的不足。造反派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二月镇反和挑起武斗，都是官僚集团与保皇派发起的先手，这种阶级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在毛逝世后运动的迅速失败。第二个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马克思定义的传统国家机器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下这些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教育、家庭、法

律、政治、传播、文化。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砸碎重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最后依然导向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的文革对重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诉求。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依靠民主，让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谈话内容的深意。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如今官方暗地里反民主，一些五毛公然地反民主，一些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可以说间接反民主。那么我们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七、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宣传正确的理论

以下对于“现代君主”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黑夜里的牛作品《“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性》，感谢他对这一部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天生的实践性，决定了唯实践论的大行其道。行动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仿佛无论自己行动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稳稳站住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于行动主义者的指责，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列宁在其不朽著作《怎么办》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批评这种行动主义，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对于群众在斗争中阶级意识抱有过高期望，认为群众最终都会导向理论正确。列宁则断然否定了这种自发性崇拜，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

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秘密。在批判民族主义就被称为托派的今天，他恐怕要会被打成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主义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在于在列宁的历史叙事中，党是斗争智慧的保存者，而群众则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得到了统一。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

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左派同志们对于领袖的崇拜。但领袖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只能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被培养出来，而不是自封或者造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一个，即中间要素——革命知识分子。以上大段篇幅是论述了“现代君主”在我们的左翼运动中的重点作用，那么重点中的重点，革命知识分子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民主对于“现代君主”诞生与成长的重大的作用，前面已经论述。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处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同时还不断有人以“爱国”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断加剧着这种混乱，痛感于这种混乱很可能葬送掉近年来复兴的左翼思潮，我们人人网上一些左派青年才决心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识，同时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与批判。只有树立起理论的旗帜，把种种错误观点清算干净，革命知识分子才会汇聚到旗帜下，而之前那种和稀泥的态度，无疑是造就一群乌合之众。

行文至此，我们运动中的策略问题，也谈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导师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觉悟的个人依然是孱弱的，就像一滴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只有无数多滴这样的水，汇聚成事业的洪流，才能拥有解放人类的力量。

转载请注明本文连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235>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 中国经济的三种前途

李民骐（2011年12月12日）

在今日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实际上都认识到，中国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方面发生巨大的、根本的变化。各派政治力量所争夺的是这种变化的方向和性质。

中国会怎样变？这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由什么抽象的、超历史的“普世价值”预先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要站住脚，都必须解决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问题，“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肯定是站不住脚，肯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什么是中国当前基本的经济问题呢？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完全依赖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然而，这种剥削也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它造成了广大劳动群众购买力的严重不足，以至于无论是劳动收入还是居民消费，现在都降低到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历史最低水平。

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与市场经济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之间的矛盾或迟或早会导致严重的消费不足的危机。中国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发这样的危机，一是过去一直依赖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二是依靠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高投资。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陷危机泥潭，出口增长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长期过度投资已经导致制造业等部门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依靠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泡沫等办法也很难长期维持。如果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依赖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仍然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一旦投资崩溃或金融危机爆发，局面将不可收拾。

中国投资占 GDP 比重现在高达约 50%。据笔者推算，比较合理的投资比重是 30%（即使是 30% 的投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偏高的）。但是，投资相对于 GDP 要减少 20 个百分点，消费相对于 GDP 就必须相应提高 20 个百分点。但是，要提高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劳动者的收入就必须相应提高，资本家的利润就必须相应减少。

中国资本家的利润十分巨大。据笔者推算，中国资本家的税后毛利润（包括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含折旧）约占 GDP 的 50%，也就是与总的投资水平相当。如果去掉折旧，净利润约占 GDP 的 35%。现在，如果利润占 GDP 的比重要减少 20 个百分点，净利润占 GDP 的比重就必须减少到约 15%。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必须放弃他们的总净利润的约 60%，中国的宏观经济才能实现基本平衡。这样一大笔钱到底由谁来出呢？中国的资本家阶级愿不愿意做出适当的让步以实现“可持续剥削”呢？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现在的经济精英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集团：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国内买办资本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国有资本；主要与国内市场相联系的一般私人工商业资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公布的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企业利润分布，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约占全部工业企业利润的 30%，外国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约占 25%，私营资本和非国有控股的股份企业约占 45%。考虑到私营资本中的一部分属于买办资本或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那么就财富分配来说，上述三个集团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

就权力分配来说，近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有利于上述第一个集团的，即买办资本和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该集团并且控制了绝大部分的主流媒体，并且已经渗透到军队院校和政治工作部门中，散布恐美崇美思想。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要实现宏观平衡，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必须放弃他们的总净利润的约 60%。这笔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将怎样分配呢？与现有的财富分配情况相比较，不难看出，要解决未来的中国经济问题，将很可能需要牺牲三大经济精英集团中至少两大集团的根本利益。

左派和右派目前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设想无非是以下三种。

第一种前途，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赞成的前途，即实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按照“普世价值”建立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改旗易帜，全面公开复辟资本主义。

这种前途的实质就是买办资本和出口制造业资本集团伙同私人工商业资本之一部或大部，共同瓜分剩余的国有资产，并妄图将私有化的非法所得永久地据为己有。为了掩盖他们过去和未来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行，他们需要打出“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一类旗号以取得所谓合法性，为此必须与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做彻底的割裂。

这部分经济精英势力很大，得到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支持，在党内也有后盾，在国际上有声援和财援，并且暂时仍然可以欺骗一部分小资产阶级。

不过，普世派精英的如意算盘还是不宜打得太早。二十一世纪不是 1989，中国也不是前苏联。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已经经过正反两方面教育，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向往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如果马列毛左派能够坚持目前的工作方向，到群众中去、到工人阶级中去，端正方向、注意策略，并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保持内部团结，那么，在未来的紧要关头，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彻底粉碎普世派的复辟阴谋是完全可能的。

万一普世派阴谋暂时得逞，也不要紧。普世派精英如果暂时得逞，并丧心病狂地将剩余的国有资本全部私有化，从而使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到一小撮资产阶级手中，那么必然使原来就已经很难克服的消费不足的矛盾更加激化。其结果，很可能是导致经济危机提前到来，并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更加深刻。那样，问题就不仅仅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这就必然为第二种前途铺平道路。

第二种前途，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以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阶级矛盾全面激化的客观形势，吸取俄国 1905 年革命、俄国 1917 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历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奋起反抗并彻底推翻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彻底清算一切非法私有化以及买办资本，没收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同时对一切暂时保留的私人资本实行工人监督，将血汗工厂、黑砖窑黑煤窑、开胸验肺等丑恶现象一概扫尽历史的垃圾堆。

如果真地走第二种前途的道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固然是灭顶之灾，劳动人民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前途呢？要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必须做出大的让步。中国的经济精英集团要想保全一部分利益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不让步或者仅做一点象征性的让步，最后都是难免失败的。

如上所述，要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问题，需要牺牲三大经济精英集团中至少两大集团的利益。可以牺牲国有资本集团和一般私人资本集团的利益来保全买办资本和出口制造业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吗？如果是那样，买办资本势必将他们所侵吞到的国有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利益全部或大部据为己有，而决不会拿出来与劳动人民分享。

可以牺牲国有资本集团和买办资本集团的利益来保全一般私人资本集团的利益吗？一般私人资本集团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力量单独挑战上述两个集团，而且，离开了上述两个集团的庇护，一般私人资本集团也不可能站住脚。

唯一可以设想的方案是，国有资本集团在将来适当的政治条件下，下决心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结盟，清除、消灭买办资本集团，从而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必要迫使私人资本集团在工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等方面对无产阶级做出相当的政治让步。

要实现这种前途，固然需要广大的马列毛同志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准备条件，也需要党内的有识之士在适当的时候对党做出正确的引导。特别是在未来危机来临之际，党内的有识之士要善于将危机当契机，果断地与买办资本集团割裂，在社会上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上依靠国有企业，在专政机关中依靠毛泽东思想，必可实现党和国家的全面“左转”。如此，则功在国家，利在个人。

（这种左转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来临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被迫牺牲资产阶级其他部分的利益以换取保全自己的利益；而对无产阶级来说，经历一个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有利条件，并在无产阶级更加强大以后一举实现社会主义）

如果能走上第三种前途，那么就可以避免第一种前途、搁置第二种前途，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利，付出的代价又相对较小。对党内有识之士以及曾经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士来说，则可以避免被普世派清算的尴尬下场，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

如若不然，那么就必然要走向第一种前途；然而第一种前途终究也是走不通的，最后必然还要走向第二种前途。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勿谓言之不预也。